

王安忆文本中的婚姻世界〔*〕

○ 裴艳艳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婚姻问题是人类社会中两性关系形式的一种主要体现。在王安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到21世纪初的文本里,对于婚姻的探讨范围广泛,涉及到普通家庭婚内相处、婚外恋、城乡联姻、离婚、冥婚,知青背景下的婚姻、小新娘的婚姻、拐卖婚姻等。通过考察这些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婚姻形态内涵,反映出王安忆在整个创作历程中对众多婚姻问题的自觉实验和探索,鲜明揭示出作家于平民婚姻立场下,重视两性婚姻中的精神因素,理性审视金钱地位权势地域的复杂影响,力图构建两性和谐婚姻状态的理想。但是,不可否认,王安忆20余年的婚姻文本中,所追求的理想婚姻世界是一个成功与失败相互交织的艰难过程。

〔关键词〕王安忆;小说;两性;婚姻

婚姻是文学作品的一种重要创作主题。这个问题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紧密相关,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产生出相应形态各异的两性关系内涵,折射出性别视域下人类思想的内核。王安忆对于婚姻问题的思考具有自觉意识,虽然她创作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婚姻类小说则是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但是并不影响其对婚姻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探索。自80年代初,经过90年代,及至21世纪初,婚姻小说贯穿于王安忆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就作家创作发表的情况而言,从小说篇幅上看,这类小说覆盖了短、中、长篇,以短篇小说居多。从小说

作者简介:裴艳艳(1973—),文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地方文学刊物与中国当代文学史”(项目编号:12YJA751065)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厅2012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制与出版”资助。

发表的刊物看,主要有《小说季刊》、《青春》、《北疆》、《收获》、《钟山》、《女作家》、《芙蓉》、《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从时间上讲,以20世纪80年代较为集中,发表的小说较多,代表性小说有九篇。而90年代和21世纪初分别为四篇。在王安忆的众多小说文本中,其对于婚姻问题的关注面广泛,对婚姻中的多种状况进行了探讨,涉及到普通家庭婚内相处、婚外恋、城乡联姻、离婚、冥婚,知青背景下的婚姻,小新娘的婚姻,拐卖婚姻等。本文通过考察这些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婚姻形态内涵,揭示出王安忆在整个创作历程中对众多婚姻问题的理性思考。

一、排除物质束缚的平民婚姻立场

新时期伊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物质经济和人们生活的相互关系被悄然纳入热议的话题。王安忆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锐,把思考的触角延伸到家庭生活中的婚姻一隅,在创作中自觉探讨物质经济条件之于婚姻的影响。当她首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两性中的婚姻问题时,展现的便是金钱、地位、住房等物质因素对普通大众婚姻中两性关系产生的作用。显然,王安忆在这个婚姻关注点中选取平民作为塑造对象,婚姻态度也很明朗,主张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能给婚姻中的两性带来幸福。这种鲜明的排除物质束缚的平民婚姻立场,其实奠定了王安忆在8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初期的一种婚姻观念基调,已经隐约显现出其重视婚姻中精神因素的超然姿态。

王安忆对于婚姻的这种看法在小说文本中呈现出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动态变化,《小院琐记》(1980年)和《归去来兮》(1982年)体现了这个思考过程。短篇小说《小院琐记》是王安忆对婚姻问题进行探讨的最早之作,它发表在1980年《小说季刊》第三期上。这篇小说取材于文工团生活,主要写了居住在文工团小院内的几个家庭的婚姻状况。作者首先交代文工团小院的家居背景:“别看小院又破又乱,可它成全了好多对小青年的婚姻,又使好多三代同堂的家庭终于能分离出一代,还使得不少超过婚姻年龄的光棍具备了找对象的最令人鼓舞的条件。”^{〔1〕}围绕着这样的居住环境,作者刻意写了以下几对家庭的婚姻状况:一对是文化局长的儿子黄键和他的妻子李秀文,他们住着小院内最明亮最宽敞的房子,屋内家居豪华而现代,是这个破破烂烂小院内的奇迹。但是黄键经常出去玩,李秀文独守家中,而两人在一起时,要么话少,要么争吵,夫妻关系紧张;一对是舞美队的木工记小中和连珠,他们住在厕所旁的八平米小屋。虽然住房寒碜,但是他们两人恩爱,并保留着浪漫而坚贞的爱情和见证:十包十年的恋爱两地书;一对是小说叙述者我和阿平,他们住在排练厅里的一个方块。两人感情甚笃,但是因为家庭的贫穷和巡回演出的动荡,我虽偶尔也与阿平赌气,可最后两人仍然和好如初;一对是姜迈和小章,虽然相爱,但因为钱经常不够,时常发生善意的争吵。小说集中刻画的是黄键夫妇和记小中夫妇,这两个家庭的居住和婚姻状况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家庭住房最好,物质富有,但夫妻关系冷

淡；一个是家庭住房寒酸，经济贫穷，但夫妻关系和睦。那么，作者以文工团小院的住房为依托，通过这几对家庭婚姻的描述，在这篇小说中所要表达出的对于婚姻的看法是明显的，即婚姻生活的和睦幸福与物质条件有关系，但并非是必然关系。

《归去来兮》中提出的婚姻问题渐趋清晰，即婚姻中的双方，面对财富和地位的悬殊，究竟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来对待婚姻？小说中的男主角阿桑出身普通的中学教师家庭，他的妻子真真出身物质优裕的大资产家庭。他们新婚后，没有在阿桑家的小房子住，而是一起搬到了真真家，两人为拥有优越舒适的生活条件而感到幸福。然而三个月后，阿桑体验出了这个大家庭内部为财富和地位展开的无形战争和攀比，也慢慢陷入其中。小说中的一个典型细节是，他不惜伤害母亲的感情，偷偷利用父亲旧时恋人的海外关系，得到了钱和外汇券等，以拥有海外关系来取得自己在大家庭中的认可地位。但是，随着他日益适应这个大家庭的纷争和攀比，真真对他的感情越来越冷淡，甚至流露出了悲哀的情绪。因为真真之所以选择他，就是看重了他的诚实和正直。可是，此时的阿桑变了。于是，当阿桑沉醉在攀比成功的喜悦中时，“然而，真真在他一系列的挺进和胜利面前，却出奇的沉默，她冷冷地看着阿桑。”^[2]真真对阿桑在大家庭内的攀比行动进行了无声的对抗时，阿桑面对她的反应，困惑了。两人关系的转机始于真真的生日。真真渴望过一种摆脱攀比纷争的生活，她考上了夜大。生日这天，真真以上学为由，让阿桑一个人去应付众多的宾客。阿桑在此次独自赴宴中，真正感受到真真所说的这种生活的庸俗和无聊，他明白真真为什么对自己冷淡的原因了。返回后，他默默地与真真达成一种共识，一起搬回自己家住，两人关系和好如初。对于阿桑的思想变化过程，王安忆表示出清晰的态度：“那颗小市民的灵魂，它应该净化和回归！我不否认人对繁华的物质生活的追求，生活应该日益便利、美好，四个现代化应该尽快来临。但是在都市的繁华、生活的建设的同时，人也产生了异化，人与大自然越来越远。人开始失去很多美好的品质。然而，如果，人没有了质朴、纯真，生活毕竟要少了很多光彩，世界，毕竟要逊色很多。去，是难免的，但愿能归。我愿阿桑归来。”这篇小说揭示出了因财富和地位悬殊所形成的门第观念，对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不过，应该看出，此篇小说针对阿桑与真真婚姻关系的变化过程，已经表达出一种明确的观点，即优裕的财富和地位并不能给婚姻带来幸福。对于这种因贫富产生的婚姻状况，如果说1980年的短篇小说《小院琐记》显得不是非常清晰的话，那么此篇小说体现的就很明确了。

除了关注婚姻中的物质因素对于两性关系的影响之外，80年代的王安忆文本对于婚姻问题的思考还具有以下关注点：

1. 婚外恋：一个有悖婚姻道德的隐形话题恋

对于生活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讲，婚外恋仍是一个有悖婚姻道德的隐形话题，而作家能够大胆表现并创作此种婚姻状态的作品，确实需要很大

的勇气。然而,由于文革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现实家庭中存在一些具有较大两性差异的“不幸福”婚姻。面对 80 年代初的这种婚姻难题,有的家庭会选择解体,有的家庭会选择固守,有的家庭会选择沉默。王安忆在解决这类婚姻困境时,选择的策略是两性中的一方进行突围和拯救。不过,这只是代表了王安忆在文本中假设的一种婚外恋突破途径,至于实施的结果究竟是否会使已有差距和裂痕的婚姻得到拯救,作家并未在文本中给出答案。这说明,王安忆针对时代因素造成的婚外恋,既有作家的超前察觉意识,也有提倡积极直面的魄力,又有探索者的实验心理。

王安忆文本对于婚姻中婚外恋的思考始自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80 年代后期再度进行探讨。在这两个时期中,王安忆对于婚外恋的思考点不同。80 年代初期婚外恋受到时代因素影响,因两性中男性的身份地位变化而产生。面对婚姻变故,女性进行自我反思,体现出一种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金灿灿的落叶》(1981 年)体现了对这种婚姻状况的思考。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在文革时期恋爱结婚的夫妇,莫愁和丈夫他。小说写文革结束后,莫愁和丈夫他本来都可以考大学,但莫愁为了他和家庭,作出了牺牲,但考上大学的丈夫他又爱上了一个年轻有学识的大学生姑娘,莫愁陷入了精神极度痛苦之中。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这样的婚姻现实,莫愁经过思想的痛苦之后,没有一味消沉下去,她最后终于想到:“一个人呢?首先要有自己的存在,然后才能去爱,去给予,同时接受别人的。”^[3] 她向丈夫他提出恳求,给她一年时间,她要考大学,拉近与他的距离。这篇小说涉及的婚姻问题,一方面带有时代的投影。因为文革结束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中国,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在众多的考生中已婚者不在少数,而这部分人上大学之后,有的家庭婚姻出现了危机。王安忆的此篇小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现实婚姻问题,因此它带有时代意义。另一方面,莫愁发现丈夫移情别恋后,自己的思想经历了由痛苦—迷茫—清醒的过程。她最后想到以自己的努力来挽回婚姻的决定,体现出女性面对婚姻危机时的大度和睿智,同时也体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由昏睡(为丈夫和家庭牺牲自我)—觉醒(“首先要有自己的存在”)的变化。因此,此篇小说又流露出女性面对婚姻难题时,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期望以自我的进步拉近与对方的差距,进而挽救出现危机的婚姻。

而到了 80 年代后期,随着时代政治因素的淡化,王安忆文本集中表现由两性婚姻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婚外恋。从文本所要表达的婚外恋内涵看,婚外恋的产生主要源于婚姻生活中过度熟稔所引起的婚姻疲惫。单调、寡味、惯常的婚姻生活使女性渴望暂时摆脱这种婚姻状况,婚姻中两性关系产生危机。《锦绣谷之恋》(1987 年)叙述一个女编辑的婚外恋。仔细分析,便可发现,女编辑之所以有婚外恋情感发生,是因为与她现存的婚姻状态有着密切关系。小说开篇就写到一个秋天的早晨,女编辑她醒来,看着躺在床上的稔熟的丈夫,她的心情忽明忽暗,时高时低,甚至微微有点恶心,而他的丈夫终是不动。接着丈夫起床,他们有条不紊地洗漱、吃饭。然后按照钟点,各自先后出门上班。走在上班的路上,

小说交代了她对于自己家庭的乏味感,透漏出了家庭危机信息,“这个家她是熟到熟透,再没有什么能够激起好奇和兴趣了,她用不着留心,也都明了。只有走出了家门,她的生活才开始,在家里,则只不过是生活的准备罢了,犹如演出的后台。”^[4]小说接着又交代了她下班回到家后莫名的激怒心态:“可是他对她熟到底了,她还有什么瞒得过他的!她已经是这样了,她已经是这样了啊!就这样了,就这样!她泪汪汪、气汹汹地在心里嚷。”^[5]吃过晚饭后的厌烦和无奈:“他们虽都觉得厌烦,却又走不出这狭小的蜗居,各自去寻一份快活。他们好像早已被挂在一起,只能够在一起了,是好是坏就是在一起了。”^[6]这是女主人公参加庐山笔会,发生婚外恋情之前婚姻状态,这一天的婚姻感受至少代表了她一段时间的婚姻状况:稔熟—乏味—憋闷—厌烦—无奈,这些感受本身就潜伏着婚姻危机,那么,女编辑在此后庐山笔会上的锦绣谷之恋,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篇小说谈到了婚姻中的婚外恋情,这里无意于分析婚外恋中的具体男女关系,只是就婚外恋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到这种缺乏生机和活力的婚姻状态,它给和谐稳固的婚姻所带来的危机。由此可见,这篇小说涉及到的婚外恋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 城乡联姻:向往文明的城乡冲突

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是王安忆能够驻足农村生活的创作资源。作为69届初中生,王安忆初中毕业之后到安徽农村生活了两年多,青春的激情和记忆在此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返城之后的王安忆进行不同主题的文学创作时,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宝贵的农村生活体验。她对婚姻问题的思考也不例外。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城乡联姻中的两性关系进行探讨就运用到了王安忆插队农村的生活,并且到了21世纪初期,她又对类似婚姻问题投以关注。这是作家采用回望已逝农村和立足当下城市相结合的方式,对城乡联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比这两个时期的婚姻内涵,虽然都是思考农村女孩子通过婚姻的形式在城市立足,但是体现的问题却具有很大的不同。

80年代初期,王安忆文本中对于城乡联姻的思考集中于探讨这种形式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具有城乡差别的两性在婚姻中的现实处境。农村女性因对城市文明的极度向往使其在城乡联姻中表现得异常主动,从而在婚姻中失去了自我,两性的婚姻生活并不和谐。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城乡冲突在婚姻领域的体现。《冷土》(1982年)体现了这类婚姻思考。它所反映的婚姻主题在21世纪初仍具有现实意义。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在知青插队时期,大刘庄姑娘刘以萍经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的一个报社工作。为了彻底摆脱身上的农村烙印,刘以萍放弃了农村纯洁的爱情,一心把自己的婚姻定在城市里,她要在城市扎根,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为了实现这个婚姻目标,刘以萍主动出击,让别人介绍,自己寻找。终于,她找到了同在一个小城工作的十四中教师谷启亮。但是,从谈恋爱到结婚,因为刘以萍抱着明确的婚姻目的,而谷启亮是一个缺乏主见的柔弱男性,所以在刘以萍的不断催促下,他们匆匆恋爱,匆匆结婚。刘以萍虽然如愿以

偿,把家安在了城里,但是从恋爱到结婚,只是她给予他,谷启亮那里她得不到温暖,如小说中描写二人对待他们婚姻的态度:“刘以萍付出了自己一腔的热爱,无微不至地体贴他,把他当个糖娃娃似地捧着。”^[7]而谷启亮“临到这会儿,他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喜欢她,甚至,有点讨厌她。”^[8]刘以萍在婚姻中渴望温存,但谷启亮不能给她什么,她还要照料他。因此,在小说末尾,写到了刘以萍想到自己的婚姻前景时,心情冷清而黯淡,只好把婚姻的希望寄托于快点生个儿子。应该说,刘以萍的婚姻从恋爱的开始,就树立了痛苦的前提,“她是以一个乡下人浑实的方式去爱一个有点轻薄的城里人,注定要痛苦。”^[9]王安忆在这篇小说提出的婚姻问题是,具有城乡差别的男女应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婚姻关系?或者是否有建立的可能性?刘以萍和谷启亮的婚姻,从形式上看,获得了成功,但是,从婚姻的实际内容看,却是一个失败的尝试。

当到了21世纪初时,王安忆文本中对于城乡联姻问题投入了新的思考。这时乡村女孩子向城市发展自己的婚姻时,已经去掉了80年代初的那种城乡明显的对立和冲突,农村女性在选择自己的城市婚姻时具有一种清晰而本分的认识,因而获得了婚姻中的幸福,城乡婚姻出现融合趋势。《富萍》(2000年)虽然不是直接描写婚姻生活,但是与婚姻有密切关系。这篇小说主要写乡村女孩富萍来到上海,如何在上海扎根的过程。王安忆这样看待“富萍这个人物,她是在一个生活秩序已经相当完善、已经不太允许有外来人口进上海的时候,来到上海的。我写的是她怎样渐渐地融入上海。”^[10]“她是以这种办法(婚姻:笔者注。)进入上海,在上海站住脚根,但她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奋斗,在上海,她看到了许多劳动、奋斗的女性榜样。”^[11]小说中的富萍与王安忆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冷土》中的刘以萍有相似之处,两人身份都是农村女孩子,通过婚姻这条途径在城市安家落户。有所不同的是,刘以萍选择城市对象急躁而盲目,没有认清婚姻形势就匆匆成家,所以带来了婚姻生活的苦恼和黯淡。而富萍要比刘以萍清醒的多,她既能够理智处理乡下的定亲,又明白什么样的城市人家适合自己,因此,她自己找到了城市棚户区母子,在那里安家,过着清贫但幸福的生活。从这两篇小说看,王安忆从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关注乡村与城市联姻的这种婚姻形式,不过,80年代初的城乡联姻显得激进而盲目,带有对城市人的崇拜心理,而21世纪初的城乡联姻就显得理性和现实了。

二、改变两性的无奈处境需要精神和谐的婚姻观

进入90年代,面对社会中存在的众多婚姻问题和现象,王安忆探索的视角继续更新。首先,作家紧密联系当下现实生活,思考商品经济日渐成熟的时代浪潮下,婚姻破碎的根源和处理方式及其出路。在此类婚姻问题中,王安忆把错误的婚姻选择和婚姻中不可调和的精神追求一起放入离婚的轨道,预示着和谐理想婚姻的再度破产。不难看出,作家极力期望现实生存条件能够给婚姻带来多种选择,或者提供坚持走下去的理由,无奈文本中给予的出路却是婚姻的死胡

同,这暗示出作家面对婚姻出路时的悲观思想。即使作家一直把婚姻中的精神因素看得很重要,也避免不了实验对象最终婚姻解体的结局。其次,为了不使自己对婚姻问题小说创作陷入瓶颈,王安忆另辟蹊径,把传统婚姻文化中的冥婚形象纳入创作范畴,体现出王安忆不断创新的艺术风貌。同时,文本中对于冥界婚姻美好图景的描绘,从侧面透露出作家理想婚姻建构的潜在转移,也许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婚姻和谐,只能寄予冥界的乌托邦想象,并植入乡土农民婚姻模式的遐思。再次,这个时期知青背景下的婚姻在王安忆的婚姻关注点中出现了难得的亮色。文本揭示的知青婚姻问题虽然带有外地物质条件的强烈影响,但是为了招工的两性分居实际折射出婚姻分离的一种生存焦虑。这种知青婚姻状态中两性的无奈处境远远赶不上农民婚姻的单纯和睦,体现出王安忆对于农村现实生活中简单质朴婚姻的认同,实际上表明作家轻视婚姻中的物质因素,重视精神和谐的婚姻观,委婉传达了与80年代婚姻观的微妙共振。

离婚问题体现于9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王安忆文本在这两个时期小说中所体现出的离婚内涵具有很大不同。90年代初期,王安忆文本探讨的是女性犯罪和离婚的关系问题。王安忆在这类小说中所要揭示的是两性面对离婚,尤其是女性面对错误的婚姻选择,是否存在还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米尼》(1991年)体现了这类思考。这篇小说叙述的是女性米尼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如果从婚姻角度看,正是米尼的婚姻选择和婚姻生活导致了她的歧路之行。米尼与阿康办婚姻登记时,已经和阿康有了一个孩子。米尼是在知青返城途中与阿康认识,不久便与他住在一起。后来阿康莫名消失(因偷窃被劳教),米尼却有了身孕。为了生活和孩子,无业的米尼学会了偷窃,这只是她走上歧途的小序曲。当阿康和米尼结婚后,某天米尼无意回家,看到一个自己要好的姊妹与阿康在床上,米尼无法忍受,与阿康离了婚。虽然米尼脱离了这个婚姻形式,但是一直没有能够摆脱阿康的影响。阿康后来给她介绍皮条客平头,她又做皮条客又卖淫,从此,米尼一步步滑向了犯罪的深渊。这篇小说呈现的婚姻问题是明显的,面对错误的婚姻选择和出现了意外的婚姻生活,婚姻中的两性是否只有米尼和阿康这样一种存在形式?当然,也可能存在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米尼和阿康选择了其中的一种,但这种选择无疑是不成功的选择。

90年代末期王安忆文本在离婚问题中涉及到的是世俗婚姻与两性精神追求的冲突,这种冲突以离婚的形式体现出来,表明了婚姻中两性世俗性与精神性的彻底不可调和。在《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1999年)中,妹头和小白从小认识,自由恋爱,他们走入婚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婚后,妹头在工场间上班,而小白工作之余,专心写作。他们的婚姻生活如普通家庭一样,按照日常轨道行走,有夫妻之爱,日常杂务,还有了孩子。妹头和小白的婚姻变故起始于妹头和阿川合伙做生意,与阿川有了婚外性关系。表面看来,妹头和小白的离婚因为妹头的婚外情,实际上,它涉及到了婚姻中世俗生活欲望与精神存在的抵触。从小说情节讲,妹头和阿川有婚外性关系,出于两人身上都充斥着生命的活力,旺盛

而粗野的世俗欲望。而妹头和小白不一样,妹头不考虑什么精神世界等复杂的哲学问题,她关注的是世俗的日常婚姻生活,她身上洋溢着浓重的过日子的世俗婚姻气息,而小白在应付日常生活之余,有一种精神性追求,通过写作思考生存意义。因而,妹头和小白婚姻经不起世俗欲望的诱惑,稍不留神,便遭到破坏。这篇小说在谈到婚姻与两性的精神追求问题时,与王安忆 1989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弟兄们》有相似之处,有所不同的是,在两性别设置和具体的精神问题上,《弟兄们》谈的是婚姻中的女性追求实现自我的具体问题,而此篇小说谈到的是婚姻中的男性思考有关生存哲学的抽象问题。不过,两篇小说探讨的结果都不容乐观,前者对于婚姻中的自己感到了麻木,后者以离婚的形式走出婚姻。

冥婚现象是王安忆文本揭示的另一个婚姻关注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婚姻问题。王安忆在这类小说中通过对农村结阴亲传统风俗的关注,一方面体现出农民淳朴的人情美,另一方面折射出封建传统文化在农民身上的巨大投影。1993 年王安忆去过山东沂蒙山区一个名叫谢家窑的山村,这个山村后来成为《天仙配》(1998 年)的故事发生环境。《天仙配》里涉及到了农村中的冥婚现象。小说写夏家窑打井清石头时,把村民孙惠家的独苗孙喜喜埋在井下了,而孙惠还指望十八岁的独子传宗接代和将来养老,已老早为他准备了厚厚的彩礼。村长为了鼓起孙惠夫妇生存的信心,给孙喜喜找了一个去世的小女兵,按照世间的成亲习俗,办了阴亲。当小女兵的坟要迁走时,村长和乡亲们一边代表小女兵向孙喜喜交代:结婚三年,和睦相处,她走后要乡亲们多多照顾好他和孩子;一边是乡亲们对孙喜喜的劝慰话:丈夫要自立自强。这篇小说取材独特,它通过冥婚形式,体现出在农村生活中传统乡土婚姻内容,如结婚生子等传宗接代观念在农民身上的深刻影响。

知青背景下的婚姻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到 21 世纪初王安忆文本中被投以持续关注。这两个时期中的两性婚姻内涵具有很大的不同。王安忆文本在 90 年代末期思考的是在文革特殊历史时期,时代政策对知青夫妻关系和命运产生的重大影响。《招工》(1999 年)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婚姻问题。刘海明和吕秀春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期的一对知青夫妻,因为对于在农村的婚姻生活有过清醒的考虑:“他们认为,在哪里都会有过日子和不会过日子的,会过日子的人在哪里都能过得好!所以,就并不顾虑在农村安家这件事,相反,还对在农村的生活有着种种认真的设想和准备。”^[12]因此,他们来到农村插队后,盖房、安家、生子、过日子,婚姻生活平静安乐,甚至称得上幸福。后来,刘海明为了能够招工到淮北煤矿,走后门,谎报未婚,留下妻子儿女,一个人脱离了农村。小说末尾写吕秀春与孩子相依为伴住在农村的挤面机房里。这篇小说揭示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婚姻问题的复杂性。就此篇小说来讲,表面看,刘海明在婚姻关系扮演了一个负心汉的角色。实际上,刘海明招工到煤矿的目的是为了家庭多得一份商品粮。小说中有个细节,吕秀春带着孩子到煤矿探望刘海明,两人抱头痛哭,因为矿上干活比乡下累的多。所以,这对知青夫妻的婚姻生活由幸福到

痛苦到分居的变化过程,招工是个转折点,它赋予他们的婚姻生活具有复杂的时代内涵因素。21世纪初,王安忆对于知青背景下的农村婚姻重新进行了思考。同样是对知青背景下的婚姻进行探讨,这个时期的农村婚姻与90年代末的知青婚姻相比,呈现出一种美好的婚姻状态,这与王安忆对二十八年前的插队农村经历进行重新回顾有关:“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13]《王汉芳》塑造的是一对知青时代恩爱的农村夫妻形象。王汉芳和孙绍周是一对自由恋爱的农村夫妻,两人顺顺当当结婚之后,生活恩爱和睦,生养的三个孩子像他们一样斯文。但“他们也有闹架的时候,通常是孙绍周嗷嗷叫,但有一半是叫给别人听,好像要证明他是王汉芳的男人。……(王汉芳)宽容地微笑着,退让地应着:好,好,好!”^[14]他们还有真打的时候,不过都是关起门,打完之后,该干啥还干啥,两人关系还是一样恩爱。小说篇幅不长,写出了一对充满生活气息的美满农村夫妻。这篇小说与《招工》所描述的婚姻关系迥然不同。

三、文本中的婚姻世界竭力与社会现实问题接轨

进入21世纪以来,王安忆文本思考婚姻的角度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浮躁和功利的世俗化生活,作家似乎在有意躲避当下婚姻生活中的种种难题,而把美好婚姻状态的实现付诸于未经婚姻的一种想象,这种婚姻状态探讨的是一种悬空设想与现实婚姻的草率结合,带有婚姻之梦快餐式兑现的意味。此外,作家又把婚姻探索向现实土壤的深处和边缘处挖掘,从而使文本中的婚姻关注面不断扩大和延伸,并竭力与社会现实问题接轨。

王安忆文本对婚姻问题给予新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王安忆对于婚姻问题的关注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角度,即少女通过婚纱照来认识婚姻,盼望婚姻,直到走入婚姻。《小新娘》(2002年)对于婚姻的体现具有这种特别的方式。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她还不到十六岁时,就充满了对于美好婚姻的向往,并且她对于婚姻进行想像的方式很特别,“说实在,她是从婚纱照来认识婚姻的。那种透过柔光镜,于是变得朦胧绰约的美人,都在向她招手。……每每看见影楼的橱窗玻璃里,坐着个女孩儿,造型师正给她定妆。……她心里满是羡慕,想,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她坐在那里呢?”^[15]本着这种对于婚姻的认识,她十六岁生日时到影楼照了婚纱照,接下来一心想嫁人,渴望梦想成真。她高中毕业后没几年,找了个小男孩,二十岁时急急出嫁了。这篇小说选取婚纱照这个特殊角度,表现出一个小女孩对于婚姻的认识—向往—渴望—实现,它虽然不是直接描写婚姻生活,但是对于婚姻的描述具有新颖的视角。

对于拐卖婚姻的思考是王安忆文本在21世纪初的另一个新的婚姻关注点,王安忆在这类小说中揭示出两种被拐卖女性的婚姻状态,一种是与买方男性展

开有名无实婚姻的抗衡,并伺机摆脱这种被欺骗的婚姻;一种是无奈而痛苦地接受这种被卖的婚姻。可以说,王安忆对这种婚姻问题的思考带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姊妹行》(2003年)涉及到了当代社会的拐卖婚姻问题。乡村姑娘分田和水,结伴到徐州探望分田的对象。她俩在途中因问路,分别被陌生人拐卖到不同人家做媳妇。分田与买家拉开了无形的拉锯战,表面上看,她与买家男子留三同宿一屋,实际上,她始终保持着女儿身,并终于寻机会回到了家乡。水则没有分田幸运,等到分田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有了一个未出月的孩子。这篇小说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它从婚姻这个角度,揭示出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观之,王安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到21世纪初,一直没有停止对两性婚姻问题的思考。随着她的关注点在不同年代的变化,婚姻内涵也相应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总体看来,王安忆文本在80年代对于婚姻的探讨范围相对广泛,如金钱、地位、权势等物质因素对婚姻中两性关系的影响,婚外恋、城乡联姻、理想婚姻形式的探讨,婚姻中的精神自我实现与坚守等婚姻问题,针对每个问题,王安忆关注的婚姻内涵各自不同。有的婚姻问题在80年代初开始思考,到21世纪初再度出现,关注的问题相似,但作者所赋予的婚姻内涵产生了变化,如城乡联姻问题。90年代以来至21世纪初,王安忆文本对于婚姻问题分别投入了新的关注点,如离婚、冥婚、知青背景下的婚姻、小新娘的婚姻、拐卖婚姻等,这些婚姻形式中所具有的婚姻内涵也各自不同。从这些婚姻形态可以看出,王安忆对于婚姻的关注点呈现多样化趋势,相应体现出的婚姻内涵也在不断变化。这种看似多样和不断变化的婚姻主题,其实昭显了一个共性的创作现象,即鲜明揭示出作家于平民婚姻立场下,重视两性婚姻中的精神因素,理性审视金钱、地位、权势、地域的复杂影响,力图构建两性和谐婚姻状态的理想。但是,不可否认,王安忆20余年的婚姻文本中,所追求的理想婚姻世界是一个成功与失败相互交织的艰难过程。

注释:

[1]王安忆:《苦果》,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

[2]王安忆:《归去来兮》,《中篇小说选刊》1983年第1期。

[3]王安忆:《金灿灿的落叶》,《青春》1981年第12期。

[4][5][6]王安忆:《锦绣谷之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第3、14、14页。

[7][8][9]王安忆:《海上繁华梦·冷土》,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17、133、119页。

[10]王安忆、王雪琪:《感受土地的神力——关于文坛和王安忆近期创作的对话》,《文汇报》2000年8月19日。

[11]王安忆、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钟山》2001年第5期。

[12][13]王安忆:《稻香楼·招工》,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75、1页。

[14]王安忆:《剃度·王汉芳》,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第167页。

[15]王安忆:《现代生活·小新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2-63页。

[责任编辑:钟 和]